

Changzhou Cipaì Yanjiu

常州词派研究

黄志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angzhou Cipaì Yanjiu

常州词派研究

黄志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常州词派研究/黄志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04 - 7363 - 3

I. 常… II. 黄… III. 常州词派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1248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乔 堂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246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得到江南大学文学院
董事会基金资助

目 录

绪论 常州词派的研究及其方法	(1)
第一章 常州词派的形成	(12)
第一节 特定的时代境遇	(12)
第二节 特有的地域文化背景	(16)
第三节 特殊的常州词派之经学品格	(20)
第四节 适应时代特定心态的词学风貌	(26)
第二章 常州词派的分期及其早期特点	(34)
第一节 确定词派的分期及其依据	(34)
第二节 词派的早期成员及其构成特点	(42)
第三节 常州派词人的风会与星散	(61)
第三章 张惠言对常州词派的开创	(69)
第一节 经学思想与词学思想的契合	(69)
第二节 带有矫枉过正色彩的词学观	(75)
第三节 “比兴”与“神理”相结合的创作论	(82)
第四节 “以意逆志”的鉴赏方法论	(93)
第五节 关于温庭筠词的纷争问题	(98)
第六节 赋手文心，开倚声家未有之境 ——论张惠言、张琦的词学创作	(108)
第四章 董士锡对常州派词学的修正	(126)
第一节 董士锡的生平及其词学观之变异	(126)

第二节 董士锡对常州词派理论的平衡与修正	(135)
第三节 循声兴象, 悉举骚雅 ——论董士锡的词学创作	(143)
第五章 周济对常州派词学体系的奠定	(156)
第一节 周济的生平及其与常州词派的结缘	(156)
第二节 淡化经学: 向词学艺术本位的回归	(163)
第三节 范畴对举: 开辟词论建构的新路径	(169)
(一) “空”与“实”及 “有寄托”与“无寄托”	(169)
(二) “入”与“出”及 “有寄托”与“无寄托”	(173)
(三) “就景叙情”与“即事叙景”及 “无门径”与“有门径”	(178)
第四节 审调度韵: 词律的抒情类型与美听功能	(187)
(一) 周济词律论的生成背景	(188)
(二) 对词律声情的确认与分类	(197)
(三) 四声、五音与词之美听功能	(205)
(四) 关于“入声代平声”与 “上声代平声”的问题	(210)
第五节 审美实践: 与其词论同步的艺术展示 ——论周济的词学创作	(216)
(一) 周济词学创作的分期与艺术旨趣	(217)
(二) “穷高极深之趣”与“备刚柔之气”	(221)
(三) “奇思壮采”与“浑化无痕”	(224)
第六章 常州派词统的建立	(230)
第一节 “飞卿为正, 后主为变” ——词统的萌芽期	(231)

第二节 “余少嗜此，中更三变”	
——词统的调整期	(234)
(一) 降温、韦而推两宋	(235)
(二) 纠弹姜、张而笃喜清真	(236)
(三) 退苏进辛而标举梦窗	(239)
第三节 “是为四家，领袖一代”	
——词统的成型期	(242)
第七章 常州词派的流布与嗣响	(252)
第一节 常州词派外围的呼应与推阐	(252)
第二节 对常州派词学的普遍认同	(257)
第三节 常州词派在晚清与民国之交的嗣响	(269)
主要引用书目	(279)
后记	(288)

绪论 常州词派的研究及其方法

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文学流派像清代的常州词派那样将文学与学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清代词学史上，也没有一个词学流派像常州词派那样，有如此巨大和久长的影响。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有清一代，学术与文学同期复古，在清王朝的推动和“文字狱”高压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士人大多埋首于经学与其他学术的辑佚整理、考据研究之中，知识分子的价值首先在学术中得到体现，而文学家几乎只是学者群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支流而已。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以常州地域命名的常州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实乃三块招牌、一套人马。常州籍士人、著名经学家张惠言，是唯一可以横跨这三个学术、文学群体的领袖式人物。就常州词派而言，张惠言的领袖地位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词学流派能够造成声势，正与张惠言的经学家、古文家和词学家的多重身份与多重影响有关。作为经学家，张惠言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充满陈腐之气的学究，恰恰相反，张惠言极富艺术之才情，他不但治经，也创作辞赋、散文和词。就其词作而言，虽然数量不多，但可谓既精亦佳，此有前人定评，足以为证。他亦擅长书法与金石篆刻。他巧借经学中对“词”的训释，以“意内言外”表达他的词学观与词学审美论，既顺应了学术时代的风尚，亦可谓一语双关，言简意赅。关于这一点，清人谢章铤早已一眼看出，予以揭示。^① 张惠言谢世后，曾有撰《国史·儒林传》之某尚书，欲排摒张惠言于

^① 参见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五》，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69页。

“儒林传”之外^①，其中之原因，除了认为张惠言说经“多背朱子笺注”外，当还与张氏颇善文艺且极有影响相关。另外从张氏推崇温庭筠词，于《词选·附录》“同人词”中不弃钱梦兰之词作看，其取人亦自有分寸，并不为正统观念下之穷通、毁誉所左右。

其次，常州学派属于今文经学派。至清代，此派治学的特点是能够打破传统的师承、门户观念。学派的领袖人物庄存与、刘逢禄和张惠言都是既治今文经，又治古文经，而且在清代犹存的汉学与宋学的纷争中，采取保持中立、不论汉宋的态度，这成了常州学派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阳湖古文派而言，受经学观念与经学思维的影响，阳湖文派本从桐城派衍展而来，然而其与桐城派最明显的区别，便是阳湖派既承认秦汉散文、唐宋散文的经典地位，也不排斥六朝骈文之价值与作用，其为文之取径更为宽泛。如李兆洛选有《骈体文钞》三编，影响颇大，且常州派也是写骈文之群体，阳湖文派实际上成了清代骈文一派的开创者。常州派词学与文派相同，因而也呈现出兼顾折中、兼收并蓄的姿态。他们一方面摆脱自清初以来长期纠缠于推尊北宋词还是师法南宋词之争论，另一方面也破除了自明代以来将词坛界划为豪放与婉约两大阵营的简单化模式，更不以豪放与婉约作为轩轻词家之依据，而是提出“深美闳约”作为他们词学观与审美观的总的价值取向，从而开辟出一片理论建构与词学创作的新天地。常州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反映到词学上，常州派词人反对作品成为个人娱宾侑觞、逸乐消遣的应酬之作，或是剪红刻翠、搓酥滴粉没有思想寄托的文字游戏。他们以词学本位为体^②，以诗学理论为用，以引入《风》、《骚》比兴、“香草美人”之传统表现手法，来托寓贤人君子不欲明言之旨。张

① 参见张琦《上汤侍郎书》，《常州先哲遗书·宛邻集》卷三，武进宣统盛氏刻本。

② 清代词人王闿运《论词宗派》云：“盖诗词皆乐章，词之旨尤幽，曲易移情也。诗所能言者，词皆能之；诗所不能言者，词独能之。”见《历代词话续编》（上），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张惠言自言不能诗，而于词则颇为自负，其原因，盖张氏于词有极“本色”之看法，上引王氏之言，可为张氏未尽言之引申。

惠言运用传统的说诗解词之法，通过对温庭筠词的主观性解读，旨在证明《风》、《骚》传统在词学作品中的客观存在与表现形式，使自晚唐五代以来如《金荃》、《兰畹》、《花间》、《尊前》诸词集中大量男女相思相恋的作品，因为与诗赋中比兴、象征类作品的接续，而赋予其严肃的政治主题与含蓄蕴藉的艺术品格，不但将素有“小道”之称、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抬高到与诗赋同等的地位，而且也强调了词区别于诗之艺术表现的独特之处。在清代书院、乡校教育及师友传承相当普遍、浓重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对词体新的定位，也极有利于词学观念及其作品进入教学与传承的序列，有利于它更为广泛的传播。譬如张惠言兄弟就是将词学教学列入了其在安徽歙县的学馆之中，而从张惠言到董士锡，再至周济，就是亲缘、师友间的传承；而庄棫至陈廷焯，庄士敏、杨传第与谭献，端木埰与王鹏运、况周颐之间，又有同乡、友朋与同僚间的传承与影响等等。试想，如果没有崇比兴、尊词体，强调词学创作的严肃性、思想性及艺术的本色特征，这样的词学教学与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

再次，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及创作，还呈现出开放性的态势，这也与常州学派的经学观念有关。张惠言曾从经学中的“皖派”大师金榜学《礼》，其中举人时的恩师朱珪、朱筠兄弟，友人汤金钊等均与“皖派”关系亲密，这对张惠言的经学思想有深刻影响。“皖派”之经学师承中，允许弟子对老师有不同的学术见解。^①在常州词派词学特色形成的过程中，董士锡的词学思想能够不同于张惠言，周济又能够不同于董士锡，表现出在继承中不断变化与创新的倾向，不能不说得益于他们的经学观念。张惠言是一个政治抱负极为热衷的士子，同时也是一个纯儒，终其一生几乎一直在科举考场上拼搏。其涉足词学及进行词学教学，也是在他科举人生境遇不佳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中举以后，考进士七试礼部皆报罢的经历，

^①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二“戴门后学”一节。其中有云：“夫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是他心头永远的伤痛。他编《词选》时，正是他准备第八次赴京应试之前，可谓是他科举人生黎明前的黑暗期，此情此景可想而知。张惠言之弟张琦有《答吴仲伦书》一文云：

琦虽穷困落寞，然不能守枯寂，如穷山野衲。楼馆剧戏时一至焉，酒食征逐，苟非不可与游者，未尝拒之。穷老抑郁不平之概，触于物而形于言，于是有《蓉影词》及《艳品》之作，盖亦痛哭之不可而托焉者也。传之者遂以为有声色之好，过矣。^①

既然张琦的《蓉影词》与《艳品》是在这样的心境下生成，那么张惠言的《茗柯词》呢？他在《词选序》中所谓的“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其意也就不难洞明。张惠言的词作主要是用来抒写其不欲明言之旨的，张氏兄弟将“抑郁不平之概”付之于词时，强调的是词作宣泄与抒发的载体功能。而董士锡的坎坷人生，使他的儒学思想中渗入了浓重的道家思想。周济之《怀友诗·董晋卿》前有小序云：“文笔皆绝伦，子尤美其词。仅中副车，坎壈无比，中年疣附背，自号‘支离叟’。”^②董氏在“坎壈无比”中继承张惠言“有不得已于言者”之主观抒发的同时，却增加了“自我实现”的创作价值论。其在《刘册安诗叙》中就说过：“夫人之情有所归，则易苦而为甘，化忧而为乐。古之人有终身执一艺而富贵贫贱者不足以动之者，岂非有自适于己者哉！”^③实际上是继承了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思想，即在政治仕途上得不到的东西，可以在文学创作中来实现自我的价值，从而使心灵得到新的平衡。所

① 张琦：《常州先哲遗书·宛邻集》卷三。按：叶恭绰《全清词钞》“引用书目”中有《蓉影词》（董基诚等）不知是同人词集，还是张琦所编的词选。

② 周济：《止庵诗》卷六。《求志堂存稿汇稿》，光绪十八年刻本。

③ 董士锡：《齐物论斋文集》卷二，上海西泠书社1913年版。

谓“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司空图《吴村看杏花》）者也。至周济，则在董氏的基础上借鉴书画理论，又提出了“有寄托入，无寄托出”（《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创作新命题，其理论内涵即是将创作不只看成主观情思的抒发，而是要将作品的艺术效果置于更重要的地位。换言之，周济要求作品既能抒发一己之情，还能够感发读者，并使之产生新的创作启迪或灵感。这里的“读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品受众，而是特指暂时充当接受主体的词人。在古代，词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创作、指导创作、为创作服务的。所以作品的鉴赏主体，同时也将转换成新的创作主体。那么原作的胸襟学问，巧妙构思，丰沛意象，浑融词境，也将成为读者（即词人）新的创作之源。这样原作的词旨与艺术表现，就不能浅薄直露，一览无余。于是周济提出了新的词统，以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和周邦彦四家词，作为学词者登堂入室、实现其审美理想的途径。从张惠言的“深美闳约”到董士锡的“理神于形”（《原情》），强调艺术神韵情味的深厚，再到周济“无寄托出”，提倡朦胧深隐的词境，我们可以梳理出常州派词学一条合乎逻辑、又不断变化发展的理论轨道。这使得常州词派理论的创新性与丰富性大大超过了清代词坛的另两个重要流派：阳羨派与浙西派。

综上可知，常州词派在清代词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清代词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高潮，其中对常州词派的论述往往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研究中，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与商讨。

首先是常州词派的分期问题。一个词学流派除了其领袖人物、词学主张和创作群体外，还应该有一个形成的历史区界。由于词学理论与创作永远是鲜活的、动态的，即使是词派内部的师承之间也会“或合或否，各存岸略”，那么，如何区分词派内的理论修正变化与词派外的理论流布与发展，就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前人在区划词派分期时的浑融性表述方式及因为亲缘之人、师友之间的互相推举标榜，遂使词派本来面目的把握与描述，显得愈加错综复

杂。譬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以为：“复古之功，兴于茗柯，必也成于蒿庵。”其实张惠言与庄棫间的年龄相差至七十岁，要将张惠言以下跳过董、周，直接庄棫，显然与事实不符。陈氏自己说其目的是“思欲鼓吹蒿庵，共成茗柯复古之志”，可见是一相情愿之说。谭献曾称未读过董士锡之词作，并深以为憾，估计陈廷焯连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及相关词论也未见过，其词论中对周济未置一词，即可为证。将词派形成的时间跨度扩大为百年之久，并对后来形成很大影响的是龙榆生先生。他先在《中国韵文史》中认为：“咸丰、同治以还，词家多受常州影响。”^①又后在《论常州词派》一文中云：“常州派继浙派而生，倡导于武进张皋文、翰风兄弟，发扬于荆溪周止庵氏，而极其致于清季临桂王半塘，归安朱彊村诸先生，流风余沫，今尚未全歇。”^②一说是“影响”，一说却成了“极其致”，这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龙先生将之混为一体了。新近出版的朱德慈先生《常州词派通论》就继承了龙先生的这一说法。^③其实况周颐、朱祖谋等，自己都说过与常州派有不合处，况氏与郑文焯之词论还大大溢出了常州派之范围，已不能同日而语。还有研究者认为：“常州词派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词学流派，是从陈廷焯开始的。”^④陈氏连周济都不知道，如何能成为词派的“开始”者？此外还有一些别的说法，此不一一。一个词学流派的影响可以长久存在，但一个流派的本身则不太可能跨越百年。因为这里所论的词派，系指在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特定的词学群体，与通常所谓的“苏辛派”、“柳周派”显然不同。方智范等撰的《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将常州词派分为确立发展期及其以

① 龙榆生：《中国韵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② 龙榆生：《论常州词派》，载《同声月刊》第一卷第十号，1941年9月出版。

③ 朱德慈：《常州词派通论》：“本稿以为其共经历五代作者，可分三个时期。发轫期：从张惠言到周济；拓展期：从端木埰到庄、谭；光大期：四大词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页。

④ 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后的流衍期，以为：“常州派词学观点为词坛所注目、所接受，是在道光以后。”^①实际上也就将常州词派的本身与其影响区别开来了，这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对词学流派形成时代的确定，不但关乎其原始风貌的确定与描述，也有利于对词派成员的认定。

一个词学流派的形成，除了有其开创者外，还应该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它产生的特定文化背景；二是有相同词学倾向的共时性词人团体；三是重要词人之间应有直接之相关性，即师承或友人之统系。周济与张惠言虽未曾谋面，但他与董士锡的结识实源于对张氏词学思想的认同。由于李兆洛与宜兴的乡情关系，周济很早便与常州派其他成员所结识。在陆继辂的《冶秋馆词序》中，将周济与董士锡、蒋学圻、董佑诚等十余人并列为“论词皆因张氏”的第二团队，而李兆洛请画家所绘的十四人《同车图》，不但这十余人几乎与陆继辂所云者重叠，而且“扬鞭而顾若指示车中人者为保绪”^②，“保绪”是周济的表字，足见周济在这个群体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一个词学流派，常州词派的理论与创作之关系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古代，词人可以没有理论，但绝不可以没有创作。从某种角度看，有成就的词人，其作品就是其词学思想的形象化表露。反过来讲，词学理论却不能代表其创作，因而也不能代表其词学之全部。常州词派能够成立并形成广泛的影响，其创作实绩不能低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吴宏一先生著《常州派词学研究》，于“如何研究常州派词学”一节以为：“就词学而言，我以为常州派影响后世最巨而且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的词论。所以本文的讨论，以词论为主。”^③这个论断亦复反映出长期以来对常州词派的认知，以致常州词派研究一直囿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范围之内。随着清词研究的深入，清词的创作成就必将会进一步受到研究者的

① 方智范：《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② 蒋彤：《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2页。

③ 吴宏一：《常州派词学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0年版，第6页。

关注和重视。在这方面，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开创之功。严先生论张惠言的词云：“张惠言的词论严正而至于迂阔，可是他的《茗柯词》却情韵不匮，而且浑雅不乏疏朗，并无艰涩隐晦之病。即使托物写情，抒述‘寒士’不遇、飘泊无依或羁缚受制等，也都意与辞洽，倒是符合‘触类条畅，各有所归’的宗旨的。”^①无论如何，常州派的词作已经进入了评赏与研究的视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今天大多数词学研究而言，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而增强研究中对作品的体认与妙悟能力，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尽管这一现象正在渐渐地得到改善，但要达到前辈学者那样研究与创作双臻高境，又谈何容易！然而随着时代审美意识的变化，以前认为无甚意义的作品，会变得有意义起来，如诗学中的玄言诗、宫体诗等，已然有了新的研究与新的评价；词学中诸如元、明时代的词，清代的词包括常州词派词人的词作等等，都会有重新评估的余地。因而要研究常州词派，他们的创作是不应该忽略的。

既然称常州词派有理论体系，那么词学中不可或缺的词律论也应该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常州派词学研究中又一个长期被搁置的问题。其实在周济推出的宋代四家词中，至少有三家是词学史上公认的精于音律的词人，而浙西派推崇的姜夔与张炎，实际上常州派也是充分认同的，而姜、张更是有词律论传世的词家。张惠言被称为“律子缚不住”者，这与他并不全力作词有关，他主要的兴趣在经学上。董士锡虽无词律论传世，但其作词应徽按柱，悉遵调谱，词作之成就实出皋文之上。周济编有《词调选隽》一集，可惜今仅有《词调选隽序》一篇存世，另外《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后附有二三百字关于词律问题的论述，虽相当简略，但却透露出极值得注意的信息。有文献表明，至迟到南宋，北方的诸宫调已与宋词相互影响了，张炎之《词源》不但吸取了北曲中的“入声、上声可以代平声”的说法，而且在术语上也明显受到北曲理

①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32页。

论之浸染，“词曲合一”的格局已经形成。至元、明词，词家论宫调、管色、工尺等等，词曲畛域混一。填词家所作，如词似曲，往往少了宋词的典雅，而展现了北曲的俚俗，这是明词常为后代诟病的原因之一。^①故而至清初开始，作为对明词萎弱的矫正，词论家极辨词、诗、曲之不同，但传统的“以古为法”的思维定势，又使词论家常常徘徊于恪守古代的音谱曲调与词体必然走向新体格律诗的两难抉择之中。在词体向新体格律诗演进的过程中，清代初期的大多数词人为了坚持词与诗的区别，不赞成词律按照诗律将四声两元化，即只分平仄两声，而是强调四声、五音之用。更进一步者，则引入南北曲中语音的阴阳、轻重概念，来为词体的美听功能服务。这当然增加了填词的难度，但作为一种理论总结，它对词家推敲、斟酌、取舍字句，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周济的词律论，一方面借鉴曲律理论，提出了按抒情的种类选择词牌的理论，编撰了《词调选集》集；另一方面主张参酌曲律中的四声、五音与阴阳、轻重的搭配，为语音讽诵之美听服务，形成了由传统的“词曲合一”观，向词体诗律化转移过渡的特色。而这一特点，对后来的杜文澜、钟瑞、沈祥龙与蔡桢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常州词派的研究当然还涉及方法的问题，只是笔者在研究与写作中，从未刻意考虑过运用何种方法来进行研究的问题。然而当反观常州词派的研究与写作之时，其中产生的一些体认与思考，确也与研究方法有关。

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说到底就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如果再加上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当然更好。笔者以为，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而派生出来的研究方法可以有多种，然而本课题中主要运用的方法大致有三种，即实证归纳法、阐释因果法和逻辑演绎法。

实证归纳法是以文献资料直接求证的方法。譬如，在张惠言

^① 参见张仲谋《明词史》“关于明词曲化的认识”一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词选·附录》的九家“同人词”中，为什么会选录黄景仁的词？黄景仁不但年长张惠言十二岁，而且选词时的嘉庆二年（1797），黄氏早已谢世十四年之久了。而且黄氏主要是诗人，其词风与张惠言等人也并不相同。既然黄景仁词可以入选，那么为什么黄景仁的知己好友洪亮吉的词却不予入选？按理说洪亮吉不但是常州籍士子中的早达者，而且当时还在世，与张惠言在京师时也有往还，后来张惠言中进士还与洪同出于朱珪之门。研究者大都认为黄词不当入常州派之词流，但均未能清楚知道张惠言等特选黄词之原因。通过对“同人词”词人生平史料的排比归纳，可以发现在嘉庆二年这个时间点上，所有入选词作的常州籍词人，当时都经历过或正经历着科举考试的屡次挫折或人生仕途的坎坷困顿，黄景仁居然也有五应江南、三应顺天乡试，均未获售的经历，可见都是寒士“感士不遇”的一群，而洪亮吉此时却官做得颇为得意，正行走于朝廷上书房，所以其词作此时不可能被入选，选黄不选洪的这个“谜团”因而得以解开。这个发现对我们了解张惠言当时的心态及其词作的词心所在，是十分重要的。而这个结论的获得，离不开对“同人词”词人生平史料的获取与归纳。

阐释因果法是预知结果反溯成因之方法。譬如，常州词派的形成是一个结果，但研究其生成的原因，却有种种。周济提出以宋四家词为代表的词统是结果，而形成这一词统的过程，却需要细心地分析与梳理。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几乎就是一部有关范畴内涵、理论成因、流变发展等内容的阐释史。另外理论视野与相关知识也需要拓展与汇通。譬如，张惠言词学思想与经学思想的关系，周济“寄托出入说”与书画艺术理论的关系等，也需要比较、阐释。毫无疑问，对这些问题的联系与阐释，有利于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这里笔者还想讨论的是，词论与词作既然是互为表里的双方，也是互为因果的研究对象，那么对词作本身的研究，应该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词家的理论，词论家对作品的评赏，都需要通过具体的作品来验证；另一方面，通过对作品的研析，也可